

第六集 魯言等著

香港掌故



6.58
7

香港掌故

第六集

魯言等著

廣角鏡出版社出版

香港掌故第六集

魯言等著

廣角鏡出版社出版

華風書局發行

香港灣仔莊士頓道195-197號

灣仔莊士頓道184-186號

廣亞大廈8樓 電話：5-753877

電話：5-749495

金冠印刷有限公司

書號：

香港北角英皇道499號6樓B座

102×183毫米

1983年7月版

H. K. \$14.00

ISBN 962-226-041-1

目 錄

魯言先生談〈香港掌故〉·····	吳志森	1
從維多利亞女皇鑽禧活動看香港人早 年的生活·····	魯 言	8
新界租借史話·····	劉 偉	24
二十世紀初期有關香港前途的一次談判·····	劉 偉	53
北伐到抗戰期間有關香港主權交涉史話·····	劉 偉	67
英國為何延遲接管新界？·····	劉 偉	84
英軍侵佔深圳史話·····	劉 偉	95
五四運動在香港·····	劉 偉	105
四十年代末期香港社會見聞·····	張文元	116
一個參加中國革命的英國軍人 ——楊大衛在香港和中國的奇遇·····	李均權	134
香港與中國的政經關係·····	吳南山	169
新界民間哭嫁歌·····	譚達先	173

魯言先生談 《香港掌故》

吳志森

「我認為搞歷史，要從社會的角度去出發，不要用政治的角度去看。研究歷史一定要從社會觀察，否則就走到牛角尖了。」

一個《信報》的專欄作者說他搞的歷史是人民的歷史，從他的談話中，可以體會得出他研究歷史，都帶着這分自覺。

他是《明報》副刊每天都刊載《街坊廣場》的作者魯金（當然還有跟他一起合作的朋友），他也是十年來為《廣角鏡》寫《香港掌故》的魯言，他的真實名字叫梁濤。

他年近60，但仍精神奕奕，看起來他的外型和聲綫都有點似梁醒波。他每天的工作除了寫稿外，就是四處搜集寫稿的資料。

記者生涯



《香港掌故》一書作者，魯言先生，他的真名叫梁濤。

「我18歲開始做記者，到現在已經有四、五十年的時間。」

有四、五十年記者經驗的梁濤叔，當然對於這幾十年來的報業滄桑有很詳盡的了解。

「我當時一邊讀書，一邊校稿，寫的都是小品文、雜文之類，後來因為打仗，香港很多報人都去了澳門，當時我在澳門做報紙工作，於是跟一些從香港去的老報人，陳霞子、余寄萍等搞《市民報》，在澳門出版，而當時我負責的工作，是編電訊。」

打仗的時候，在敵人的鐵蹄底下，辦報當然困難得多了，澳門當時沒有淪陷，言論是否可以大胆一些呢？

「報紙也是要檢查的，對於日本不能敵視，因為她是中立國，也可以報導盟軍的消息，但卻不能用敵軍、敵機來看待日本。澳門政府有個檢查處，叫做華務科，每日的報紙都要送檢後才能出版。」

梁濤叔說他當時編的電訊是很有意思，德國宣佈投降，日本宣佈投降的消息，在報館中都是他最先從收發聽知道。

做老記、老編在香港來說待遇都是偏低的，這個現象是否一貫的呢？

「戰前寫稿，一個專欄大概 600 字稿酬是 1 元，即兩元 1 千字，兩元在戰前已經很好使了，一個人一個月的伙食費接近打仗是大概 4 元。」

原來當時的「寫稿佬」待遇也不錯。

「後來打仗，物價上升很多，要維持生計，不單要寫稿，又兼編電訊，才可以賺得一餐粥一餐飯。當時是給底薪的，提升也追不上物價，例如戰前 20 至 30 元人工已經很高的了，打仗時給你 60 元人工，加了一倍，但米價卻升至 300 元一担！

「那時候，編輯、朋友上茶樓，大家什麼也不吃，只先吃一碗白飯，撈一點豉油，比吃價錢差不多的點心實惠得多。」

除了編電訊之外，梁濤叔當時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寫副刊的文章。

「當時的副刊，都是搞一些故事、掌故、歷史的東西，而掌故多數是廣東民間的。」

「在廣州，有很多報紙出版，而差不多每分報紙的副刊都搞一版掌故歷史之類的內容。」

請道友食鴉片煙搜集資料

那麼，他們是怎樣搜集資料的呢？

「戰前有一個叫高峯的人寫掌故，因為當時還未禁煙，請那些道友食鴉片煙，然後要他們講些故事，用這樣的方法拿資料。那個時代的歷史資料都是口傳

的，道友四處去找煙食，便聽到很多故事，高峯是靠這個方法去掌握歷史。」

「而我們自己一班人，不是這樣做的，我們找一些縣志、通志、方志之類，這些書都記載很多古蹟，什麼官員做過什麼東西，根據這些記載，將它變回通俗化，然後用三及第的文體，把它寫出來。」

梁濤叔49年來到了香港，一直以寫稿為生，除了寫一些掌故、香港歷史之類的稿件外，對於香港發生的大小事物，都有著敏感的觸覺。尤其是一些鮮為人注意的現象，都逃不出這位老記者的觀察力，而給他發掘出來。

「搜集資料的方法有兩種，一種是歷史資料，一種是現代的。歷史資料要找些縣誌、刊物、期刊。人們不注意的東西，我就去找。例如同鄉會的會刊，會刊就是講同鄉會的歷史，但沒有人會留意它，就算到該會去找有時也找不到。但這些東西卻很有用。」

「新資料就是靠行，所以經常要旅行，我行了20多年，香港每個地方我都去過。」

「我每去一處，都到一些最下層的茶樓飲茶，有時到一些廟堂寺院看看，跟尼姑和尚道士談談，那些人，在那裏住得久了，就知道那地方的變化，跟他們談，就可以知道很多資料。」

「其實，搜集資料都要花很多開支的，除了因為四處去要花交通費外，有時又要花一百幾十元買些東西才可以問到一些資料。如果唐突地問他們，有時不會理睬你，又會驚嚇他，有些人很怕記者的，有些又怕商業調查。」

也由於這些「招數」和經驗，很多老記都曾經歷過，故他要懂得更多招數去隨機應變。

要從社會的下層角度去研究

梁濤叔研究香港歷史，可說是數一數二的專家了。他在這方面有什麼心得，又有什麼值得我們注意的呢？

「正如剛才我說，」他再三強調：「要從社會的下層的角度去看，不要從政治觀點去看。」他搞的歷史，是人民角度的歷史吧！「以前很多人寫香港史，都是從一些外國人，如安德葛的研究那裏搬過來的，是用英國人的眼光看香港歷史，而我寫的時候，是用中國人的眼光去看。」這點在香港這塊地方尤其重要。「因此，基本上我不會看外國的歷史書，除了翻查某一條法例的起源，或者香港政府有什麼改革才去參考，主要都是搜集民間的資料。」

他研究歷史的態度和搜集資料的方法，是值得只在圖書館埋頭的人注意的。

「你們有沒有留意香港神功會的組織，他們幾乎是一個社會的下層基礎，現在還有很多，最大的神功會是黃大仙，很多金舖都做黃大仙會。還有很多其他神誕，例如土地、觀音、關帝、天后，幾乎每個月都有一個大神誕，酒樓每個月都有一兩次神功會擺的賀誕酒……」

梁濤叔滔滔不絕地給我們介紹他的觀察……

「神功會每到神誕有時會演一些戲，例如潮州人盂蘭節的時候演戲，我認為一些迷信是跟戲曲有關的，因為演戲的人將古人演成真的一樣，使人覺得他是神聖的。這些從前是沒有人講的，如果不用社會的角度去看，便看不出來。」

梁濤叔跟著又跟我們談了文武廟和中文教育的關係，這不能不令人佩服他觀察能力之高和掌握資料的豐富。

60多歲的人了，還要四處走動，體力是否支持得來呢？

「我年青的時候，每天能寫一萬字，現在也可以寫四五千字，我的工作方式是沒有一定的，有時深夜寫，有時早上寫，有時在報館，有時在茶居，我有一種調劑生活的方法。例如，寫掌故，一段時間後，累了，就不寫，又寫第二樣，或出外，搜集資料。

正常的生活形式也沒有固定，一日廿四小時，每一個小時都試過在街上，每一個小時也試過在睡覺。但每天起床，無論那個時候，我都當作早上，會做點運動，才開始工作。」

要不要找接班人

像梁濤叔一樣研究香港史的人有那幾個呢？

「林友蘭，寫《香港史話》的那個，但已經死了，還有葉靈鳳，也死了，現在香港沒有那幾個寫了。」

「那麼你有沒有打算培養接班人呢？」我搶着問。

「有人有興趣，也沒有所謂培養，給他指出一條研究的路向就可以了。其實，這個是應該有人做的。」

這樣的工作可能太過繁瑣，而香港保存歷史資料的工作也非常差勁，要成為梁濤叔的接班人，也需要有那麼的一分耐性和魄力。你有沒有興趣呢？

我們不經不覺談了二個多小時，除了多一點了解梁濤叔的工作經歷外，對於他研究歷史的態度，也引發了我對其他問題的深思。

在彌敦酒店樓下，梁濤叔將插在大堂刊物架的一分旅遊協會的 Hong Kong's Visitors' Newspaper 拿給我：「這些刊物是需要留意的，它可以給你帶來不少資料和靈感。」

從維多利亞女皇鑽禧活動看香港人早年的生活

魯言

維多利亞女王於1837年登位，到1897年已是在位六十週年，在這六十年間，也是英國最光輝的時代。香港也在這時期開闢成為商埠。香港的海港亦因此而稱為維多利亞港。

1897年既是維多利亞女王登位六十週年，按照西人的習慣，六十週年紀念稱為鑽禧Diamond Jubilee，香港既以女王之名命名為維多利亞城，對維多利亞女王的鑽禧紀念，自然不能不舉行盛大慶祝，在這次盛大慶祝鑽禧大典的時候，本港有很多有趣的事發生，其中亦有很多改革，直接影響香港居民以後的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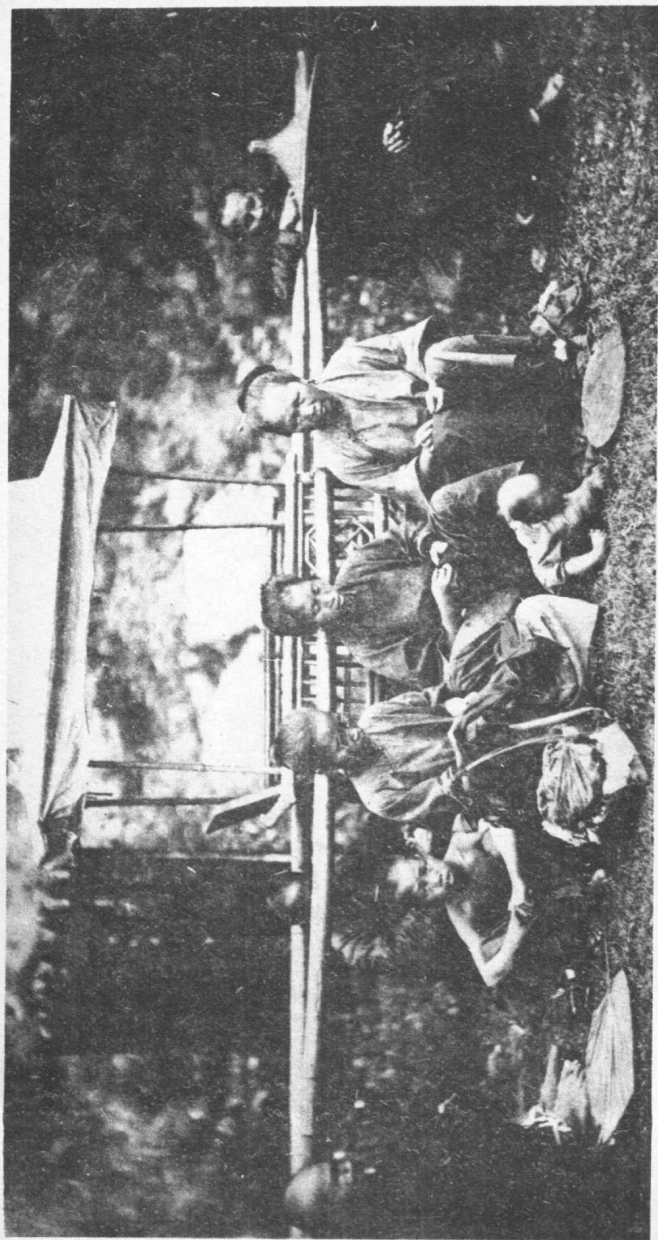
本港開埠之初，盜賊竊匪如毛，英軍為了保護自己的倉庫和地方的治安，從開埠之第一日開始，即實施宵禁。當時香港是沒有夜市的，每日上午六時開始解除宵禁，到晚上六時就實施宵禁，晚上如果仍在街

上行走，英軍有權喝令夜行人停步，加以拘捕；如果不停步則格殺勿論。

這種非常時期的宵禁制度，是有礙於建設香港的。工人來港參加鑿石、築路、建屋工作，到放工之時，已是宵禁，實在妨礙了建設。因此在1842年10月，曾一度將宵禁期延遲至晚上十一時。但是宵禁期延遲之後，劫案頻生，盜竊案又繼起，故到1844年，本港成立了法院和裁判司，建立了司法制度之後，又將宵禁時間延長，由晚上九時開始實施宵禁，到翌日早上六時止。故1849年廣州主考官何紹基來港遊覽時，賦詩一首，也有「一層坡嶺一層屋，街石磨平疊如玉，初更月出盡閉門，止許夷車奔馳逐。」之句，這是當時香港晚上九時之後即宵禁，禁止華人夜行的中國方面的記載。

一個城市發展到趨於繁榮的時候，長期的宵禁是會影響它的發展的。商埠的主要功能，是溝通貨物貿易，洋貨從輪船運來，土產從帆船自內地運來。土洋貨物需要迅速的溝通，每日有限的工作時間，不能滿足貨運的需要，足以阻礙城市的發展。因此到了1854年之後，對於宵禁又採取了彈性的政策。在原則上，仍維持晚上九時起宵禁，不過若晚上外出，則可以向警察局申請「夜紙」，帶住警察當局所發的「夜紙」在身上，就可以在晚上外出，遇到軍警檢查時，不會被拘捕。不過，只帶備「夜紙」還未足夠，必須同時備帶燈籠，因為有燈籠足以照明，顯示目標，表示夜行人是正人君子。若有「夜紙」而無燈籠，亦算犯法。這種晚上外出要携燈籠和準備「夜紙」的制度，行了五十多年。

當時香港街坊常常打醮，醮棚上有對聯一副，指出當時的情形，聯云：



十九世紀中葉，香港街頭一景。（本圖攝於咸豐11年至同治3年間，公元1861年至1864年）

既有興以來遊，帶備手燈，怕也鐘敲十一點。

慎勿樂而忘返，倘無夜紙，提防鼓轉二三更。

這副對聯更真實地反映出當時的實際情形，即晚上九時外出就要帶定夜遊通行證，這種證件，通稱「夜紙」，又稱「街紙」。我們現在外出，不論日夜必須攜帶身份證，這種「携證外出」的制度，原來是古已有之的。

至於夜行携帶燈籠，實際上是在晚上十一點才執行的。這種九點帶夜行證外出的制度，對於工人和商人工作都有幫助，因為貨運方面的僱主，可以代殷實的工人領取「夜證」，他們需要開夜工時，並無困難。商人在進行夜間買賣，也不困難，他們可領取夜行證和帶備手燈，就能在晚上作各種商業活動。

上面那副醜棚對聯，稱燈籠為手燈，這是香港特有的產物。中國的燈籠是用竹篾結紮，外面糊以油紙，中間燃點蠟燭的。這種燈籠只能在無風無雨中使用。若有風有雨，就不能使用，風可將蠟燭吹熄或將火燄觸到燈籠邊緣而引起燃燒。故香港所用的燈籠，是用鋅鐵製成，四邊鑲以玻璃，內部則用燈心和油罐燃點，可蔽風雨。這種燈籠，又稱手燈。

這種帶夜行證和手燈夜行的制度，自然不及完全取消為方便，不過由於人人都可申請領取夜行證，只須有僱主代為申請，或有殷實商人擔保便可申請，香港的夜生活亦漸漸熱鬧起來，水坑口的妓院和大道中一帶的酒樓酒家，亦由於有「夜紙」而興旺起來。此種制度，對於初來港的人，造成很大的不便。如同現時沒有身份證的黑市居民一樣，他們只能在日間工作，晚上則要龜縮於屋內，不敢外出。因他們不可能申領夜行證。

1897年，本港為了盛大慶祝維多利亞女王的鑽禧

大典，爲了達到「普天同慶」的目的，有人建議當局檢討這種携手燈和帶夜行證的制度，認爲這種制度有礙慶祝鑽禧大典的進行。

英國方面已宣佈，1897年6月21日爲鑽禧大典之期。慶祝活動由6月19日開始，至6月23日止，一連五天。香港亦同時宣佈慶祝。爲了發動商人熱烈參加慶祝，商人覺得如果仍然實行「街紙手燈」制度，反應一定不熱烈。這是促使香港政府認真檢討「夜紙手燈」制度的原因。

當年6月5日，立法局舉行會議，辯論「夜紙手燈」制度。議員們表示，「夜紙手燈」是本港開埠初期新定的制度，這種制度是由宵禁而起。現時本港已有很多人領取街紙夜行，宵禁制度名存實亡。取消携帶夜行證即取消宵禁制度，是順理成章的事。有些議員提出，初時携帶手燈夜行，是因爲本港並無街燈，現在由於煤氣公司成立，很多街道都有煤氣街燈，携燈夜行亦不需要，況且本港的電燈公司，已於1889年成立，很多商店都有電燈，携燈夜行已屬多餘。因此，即席通過取消了宵禁制度，以及携夜行證和提燈的制度。由6月5日起施行。

取消上述的限制夜生活的制度，自然獲得全港華人的熱烈支持，故商人不惜斥資大事慶祝鑽禧大典，很多商店自資蓋搭牌樓。其中一間高陞餅家蓋搭一座全港最高的牌樓，以示慶祝。據筆者搜集當年本港慶祝鑽禧大典的資料，其中高陞餅家的牌樓上，懸出一副對聯云：

門高慶，搭高棚，步步高陞。竹高隄高，手段更高，何礙往來高帽客。

爭錦綉，奪錦幟，般般錦綉，花錦具錦，文章似錦，居然出入錦衣人。



1891年6月26日（星期一），維多利亞女王在白金漢宮接見來賓情景。